

农民学丛书

中国农民变迁论

——试探我国历史发展周期

HISTORICAL CHANGE OF CHINESE PEASANTS

孙达人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中国农民变迁论

——试探我国历史发展周期

孙达人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京)新登字 3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农民变迁论/孙达人著.-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1

(农民学丛书/陈越光主编)

ISBN 7-80109-104-3

I. 中… II. 孙… III. 农民-研究-中国 IV. D4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1199 号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邮政编码:100032)

丰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172 千字 印张:6.875

印数 1001—3000 册 定价:10.4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缺页破损,请寄回更换)

《农民学丛书》编委会组成：

顾 问：杜润生 于光远

主 编：陈越光

执行主编：秦晖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孙立平 孙达人 刘志伟 李根蟠 陈支平 陈吉元
陈启能 陈越光 陆学艺 郭松义 姜义华 秦 晖
董凯忱 翟新华

外籍编委：

B. Galeski(波兰) 黄宗智(美国) 滨岛敦俊(日本)
T. Shanin(英国)

《农民学丛书》总序

已故的美国农民学家丹尼尔·托尼曾说：即使在当代发达工业化国家，“农民与农民的子孙”仍构成人口的多数。而在中国，他们可以说几乎构成了人口的全部。我们常以“世界耕地的7%养活了世界人口的21%”为自豪，却很少提及它的另一方面——以世界上40%的农民“养活”世界上仅仅7%的“非农民”！连小学生都知道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然而很少人注意到全球23亿农民中，我国农民占了9亿，即近2/5。当然，这个数据因中外“农民”定义的不同而并不准确。如果说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Farmer 或 Cultivator）中国人在其中所占比重可能低于此数据的话，那么对于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农民”（Peasant）而言，中国人在其中所占比重则无疑要高于此数据。在后一个意义上，说世界农民中的一半甚至更多都是炎黄子孙，也许并非夸张。

尤其令人深思的是：尽管在改革时代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但这并未改变我国农民人口在世界农民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的局面。1981—1985年间，全球农村人口比重由55.3%降为48.1%，即下降7个百分点还多，而我国同期仅由80.2%降至

79.9%，仅下降了0.3个百分点！倘若这个趋势不改变，那么世界农民中大半为中国人的时代如果说尚未到来，也是为期不远，而中国大半为农民的时代如果说将会过去，也是遥遥无期。据此而论的话，说农民问题就是中国问题，中国问题就是农民问题，该不算十分片面吧！

因此，中国的农民研究应该独步于全球，这应该视为生存问题而不仅仅是个荣誉问题。而这就要求中国的农民研究必须走向世界。

在国外，“农民学”（Peasantology）一词作为术语产生于60年代；而作为一门学问，国外一般将其归源于本世纪初俄国民粹派学者A. B. 恰亚诺夫倡导的“社会农学”。在60—70年代之交，国际上出现了所谓的“农民学辉煌的十年”。有人甚至说这一时期农民研究领域取得的划时代进展可与物理学领域中牛顿定律的发现相比拟（T. Shanin, *Peasant and Peasant's Society*, Oxford, 1987）。不管此说是否夸大，农民研究自那时以来取得的进展是无庸置疑的。这种进展有其深刻的背景：

第一，战后尤其是60年代以来，大批不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农业国）获得独立，使“发展问题”日益突出。“不发达社会学”应运而生。而“不发达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农民学的一种研究方式。

第二，大萧条、法西斯暴行与世界大战所展示的“现代病”促使人们对现代化进行反思，后现代思潮在战后西方日益高涨。而苏共二十大以后人们又看到了另一种“工业化文明”——传统社会主义也有严重弊病。企图在两种“工业文明”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的人日益增多。人们又想起了民粹派的呼声：“都市文明时代已过去了！”如果说“现代化”开始于对被中世纪农民文化所否定的古典城邦文化的重新发掘（文艺复兴），那么“后现代化”则唤起了对乡村的重新关注与“农民文化复兴”。尤其是近年来日

益活跃的“绿色运动”更在抨击“过分工业化”的同时明确把“支持农民与农村社区所选择的结构模式”作为己任（FPH: Program 1992—1995, Paris, 1992）。后现代主义—新民粹主义与“绿色思潮”相呼应，成为推动西方农民研究的强大动力。

第三，本世纪以来对历史与现实中的农民问题的经验性积累，也呼唤着新一层次的理论概括；农民史、乡村社会学、民俗学、农业经济学等与农民相关的学科的发展，需要更高层次的综合。过去历史学家认为古典城邦以工商立国，是奴隶制的天下，而中世纪则是庄园的世界，而现在人们发现古典城邦更大程度上是小农而不是工商业者和奴隶的集合；中世纪“庄园化”的程度也远非原先认为的那样大，因此，有必要重新估价“小农”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现代化大生产”将消灭小农的假设未被证实。不仅东方诸国“一大二公”的农业改造基本失败，西方诸国的工厂式大农场也未能战胜家庭经营的小农场，而南方诸国还出现了殖民时代的种植园在新的基础上走向小农化的趋势。显然，“小农”未来的前途也远没有人们曾经设想的那么灰暗。总之，无论认识农民还是改造农民，都需要有新思维。

这些背景今天仍在发展，它决定了农民学今后仍将是国际上方兴未艾的前沿学科。今天，农民学作为对农民群体的全方位研究，正日益以其巨大的理论魅力与实践精神，“把众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农学家团结在一种共同的兴趣之中”，并形成了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各种理论体系，其成果又反过来有力地推动了上述诸学科的发展。这对我们不乏有益的启示。

国人对农民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新中国诞生于一场新式的农民革命中，它本身就凝聚着那一代有志者认识农民、改造农民的努力。共产党人与国统区左翼知识界（如“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诸前辈等）都对此卓有贡献。而当时的地政学院及农村复兴

委员会系统诸学者、“乡村建设派”人士、满铁庶务部研究人员与来华西方专家如卜凯等，也各有造诣，自成学派。建国后，“农民战争史”曾红极史坛，党政部门的对策性农村调研从未中断，改革中的农村更是举国、举世关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农民研究被分割为农经、农史、史学以及政策研究等互相脱节的诸部门，而且受政治气候的影响大，与国际学界相隔绝，研究水平远不能令人满意。应当说，农民学在我国还处于开创期。

当然，我国农民研究的背景与国外有很大区别。别的且不论，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推进现代化，而不是“反思现代化”，仅此一点就会带来价值尺度的根本差异。如果说过去的中国思想界曾经深受“现代主义的欧洲中心论”影响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思想界同样受到“后现代化主义的欧洲中心论”影响。“影响”即交流，交流决非坏事。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西方农民学某些流派的“乡村理想主义”（rural idealism）与“乡土中国的传统思潮”具有完全不同的土壤，轻易地互认“知音”未必可取。

另一方面，在经验层次上，中国农民与外国尤其是西方农民的差异犹如国内各时各地各层农民之差异或西方各国间农民之差异一样不可忽视。当然既同为“农民”，他们又必然有共性，因而别人的研究才能为我们所借鉴。但他山之石可攻玉，却不能代玉，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农民学流派，这套丛书就是为这个目的出版的。

本丛书兼收理论研究、经验研究与工具书类著作，其意不仅在于以有限的选题，尽可能容纳多维度的探索，而且在于农民学学风的建设。当今学界，有人力戒空疏之弊而大倡微观分析，有人深恶短钉之学而力主宏观概括。其实乡土中国两千年来的传统学术一直是“义理之学”与“训诂之学”轮流称大，其流弊不在于它太微观还是太宏观，而在于它缺乏形式化的科学思维，因而难以在宏观—微观—宏观或抽象—具体—抽象的认识循环中建立实证（或证伪）机制以推动学科的发展。我们希望中国的农民学

能走出那种“汉学—宋学循环”的陈套，实现理论与经验两种研究的现代认识循环。

本丛书译、著并重，并将逐步增加“著”的比重。第一批收入本丛书的几本译作都是有代表性的国外农民学名著，作为一家之言产生过很大影响。几本国人的专著反映了作者在农民学领域的可贵探索，是非长短正待后人评说。前者为攻玉之石，后者为引玉之砖，或攻或引，总为去瑕存瑜，渐图完璧；一砖一石，但求负重为基，奠我华宇。我们希望它们都能有助于构筑我国的农民学研究大厦，为我们这个农民国度的现代化事业略尽绵薄。

本丛书由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组织并资助出版，并邀请国内外农民研究各学科的专家学者组成编委会，负责学术审定与编辑工作。在改革之潮中崛起的中农信公司以“中国农村发展”为己任，也以中国农民学研究的开拓为己任。她坚信神农之光永照华夏，中国农民的未来、中国农民学研究的未来与中农信的将来，都将充满光明！

献 辞

也许，过去在我们的史学中还没有人以中国农民的变迁为题作过著述的尝试，但我决不想用“尝试”来为拙作中的幼稚和错误辩解，却很想借此机会说明：从农民变迁的角度来着重回顾中国历史的漫长进程，揭示其发展周期，是很有必要的。虽然面对着宏大的题目，时时感到力不从心，我仍不恤自己的学识浅薄，大胆地向读者奉献这不成熟的作品，同时也算是对正在兴起的农民学研究的响应。

早年的马克思主义熏陶，加之近年来对国内外最新史学成果的涉猎，既使我更坚信历史的主体应该从上层和“精英”等极少数人物归位到下层和人民大众；同时又使我发现史学只有通过这条道路才能获得新的活力和生命。假如我的努力或有可取之处，这应归功于前贤的启迪，归功于当前我国若干地方的农民正在进行修志实践的鼓励。学者们的精辟见解和农民修志创举已被征引在本书的有关章节。假如我的努力不伦不类，非驴非马，完全是失败的，那就请读者毫不客气地予以批判，以便吸取覆辙的教训。无论如何，仅仅用少数“精英”——哪怕是最杰出的人物，包括农

民革命的领袖在内——的所作所为来替代并解释由大众造成的中国历史，这是史学中早就应该矫正的错位。“精英”意识在过去的和现在都是这样的浓烈，不仅与现代化的经济，更与现代化的政治和文化背道而驰，为求史学与现代化相适应，我想今天是把它作为清算重点的时候了。

布罗代尔在其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为现代史学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架构和体系。按照著名的长时段史观，他着重探索并描述了社会和普通大众的历史，而对宗教改革、尼德兰革命、英国革命、北美独立战争等历来被视为这个时代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却一笔带过，甚至只字未提。人们如果仍然坚持把这些事件及其代表人物视为当时历史主体的史学观点，布罗代尔的做法显然是不能接受的。因此有人就发出了难以容忍的指责：他的这种一反史学传统的做法“只能说是严重的偏见，如果不是故意歪曲的话”。无独有偶，宫崎市定在其名著《东洋的近世》中用另一种较为含蓄的方式也提出了打破传统的史学框框问题。他指出，在传统的史学中有一系列长期形成的框框；由于历史的对象无限地广阔，研究题目又无数之多，所以历史学家“可以在这个框框内安心埋头追求微细的因果关系，而无法对这个成为框框的范围本身作出反省。不过历史学家真正的任务，或许应是探讨支配了世人历史意识的各种各样框框。”宫崎市定在中国史学界享有盛誉，他的“探讨支配了世人历史意识的各种各样框框”的意见由于尚未像布罗代尔那样化为一部系统的专著，限于只对传统的“框框”作呼吁性的挑战，因而几十年来似乎也就一直都没有引起注意。我之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出两位史学大师不同于传统的史观，既非针对批评意见的辩解，亦非为之张扬，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的这种见解、这种追求和上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关于“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的意见如出一辙，从而发现这两位20世纪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其实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重

要思想。马克思主义本来就发源于非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们又看到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马克思主义中获取养料而发展了史学。这个事实难道不能启发我们早该摈弃那种僵化和纯粹的观点，使自己的思维更开放、更活跃一点吗？

继承和发展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有机构成部分，两者互相依存，密不可分。如果讲继承而没有发展，那就好比只有吸收而没有消化，结果必定蜕变为因循守旧，顽固不化；如果讲发展而没有继承，那就好比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管曾经如何光彩夺目，终究难逃迅速枯萎的命运。从总体上看，历史和现实的关系本身就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但是，必须指出，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并不是在任何国家的任何时期照例都表现为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就某一特定的地区而言，历史过程可能表现为上升和发展，也可能表现为停滞和倒退。对前一个方面的历史现象，史学家已经有足够的注意，而对后一个方面的历史现象，即使非常优秀的史学家迄今仍忽略或否定。我们已经过于长久地习惯于仅从少数“精英”的角度、而不是从人民大众的角度考察和评估历史；我们也已经过于长久地习惯于把历史视为直线进化的过程。有鉴于此，拙作对中国农民变迁的论述，首先从理论上着重分析了中国历史何以会表现为跳跃性的发展过程，接着又着力于复原中国的历史发展历程中的循环周期，意在通过揭示中国历史的主体以帮助我国现今国民多数的农民确立历史的主体意识，抵制“精英”意识。所有这些意见可能与传统的观点不尽一致，因而也就很可能是谬误的，再次敬请读者批评指教！

目 录

献辞

第一章 绪论：缩短历史和现实的距离	(1)
第一节 史学的反省和农民的觉醒	(3)
第二节 跳跃性的发展和长期性的停滞 ——探索历史发展的奥秘	(8)
第三节 一个有待开发的科学宝藏	(21)
第二章 发生论：黄土地之子	(30)
第一节 黄土地的恩赐——宗法农民的由来 及其特征	(31)
第二节 中国农民遭遇的第一次机遇和挑战	(53)
第三节 “五口百亩之家”的发生及其历史地位	(71)
第三章 流变论：农民的变迁和中国历史周期	(95)
第一节 皇朝周期循环的根源	(96)
第二节 中国农民遭遇的第二次挑战	(111)
第三节 结果破坏原因——农民的无产化 和游民化	(136)

第四节 “小、少、散”的阴影——从《水浒》 看中国农民性格的蜕变·····	(158)
第四章 结论：从回顾引出的前瞻·····	(189)
参考书目·····	(199)
后记·····	(207)

第 一 章

◎绪论：缩短历史和现实的距离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

如果我们不能了解过去，我们也就没有多少希望来掌握未来。

*

*

*

因而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历史中也有我们骄傲和自卑的理由。我们不必为过去而过多地烦恼。我们需要了解过去并揭示其与未来的关系。

——引自李约瑟著《中国与西方的科学和农业》

历史是亿万群众自己创造的；它的进程无疑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和逻辑。但是，认识这些规律和逻辑真是非常非常之不容易，唯其如此，也就显得格外重要。当前，现代科学对小至细胞的基因，大至银河宇宙都能揭示其奥秘，生物工程、宇宙飞船、信息高速公路等等，日新月异，不一而足。反观人类社会，我们对自己每日每时都在参与创造的历史，研究情况究竟如何呢？认识水平究竟如何呢？说一句不客气的老实话，两者之别，不啻天壤。其丰富和贫乏、深刻和浅薄的反差之大是谁都掩盖不住的。试问原因到底何在呢？这种现象难道是正常的吗？

自然现象不仅是人类可以通过复制而直接被感知的事物和过程，而且，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人类对自然每一重要的认识飞跃还能给自己直接带来越来越大的福祉。但是，历史研究则不同，由于它具有不可逆性，就既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进行重复试验以观真伪，其成果也难以弥合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传统农业社会，人们的生活变化还比较缓慢，这种距离因此而较短，历史和现实的差距还易于被发觉和总结，因而那个时代的人们一般都比较重视历史和史学。中国史学也曾取得了与时代相称的成就。最著名的例证是伟大的司马迁。他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①的崇高追求，他那深刻的识见，他那敢于批评时政、特别是当朝皇帝的无畏勇气，他那不朽巨著《史记》的风采——“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2000多年后的今天仍令人神往。但是，勿庸讳言，我们的史学现在出现了危机。它越来越故步自封，它老化了。史学的空前冷落是这种危机的直接表现，而真正的根源却在于它脱离了与广大群众和现实之间的血肉联系。如果史学再不更弦易张，依然固我，那就势必由于生活的快速嬗变而造成与现实更大的脱节。本来，人世间的一切问题没有比未来更为重要的了，而认识未来，除了通过研究历史之外就别无他途。无论是一个集团、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是整个世界，

“往者已已矣，来者犹可追”。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有生气，是否有活力，看一看人民群众对自己的历史持什么态度，达到了怎样的水平，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因为，重视历史正表现出它对未来的关心和信心；深刻的认识则表现出一个民族、而不仅仅是少数人的觉醒。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固然不可避免地拉大了历史和现实的距离，试图找到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也更加困难了，唯其如此，史学不是无用了，或者可有可无了，现代社会对史学的需求反而更高也更加迫切了。如其不然，我们的先辈、我们的父兄用血汗所换来的这唯一的经验（包括惨痛的教训），岂非统统要付诸东流？如其不然，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岂非等于又回复到了原始蒙昧时代，还是“盲人驾瞎马，夜半临深池”？是不是应当这样说，当前的史学危机证明：现时代的快速嬗变已在呼喊新史学，而史学也只有在变革中才能找到自己在现代社会的位置和生命。

中国是一个最古老的农民国家，迄今为止，它还是世界上农民人口最多的国家。研究中国历史虽然应该涉及各色人等和一切方面，不过，无论如何，农民始终应是我国史学主要的研究目标。否则，我们写出来的历史最多也只能是与我国历史主体间接有关的枝节。本书就是以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人群为对象，用鸟瞰的考察方式所作的一次大胆尝试，试图从总体上评估其发展轨迹和历史价值，从而为缩短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提供一种新视角。

第一节 史学的反省和农民的觉醒

自人类出现以来，农业的发明是一次影响极为深远的革命。它使我们从此摆脱了采集渔猎经济中完全依赖自然条件的限制，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生产自己所需要的食物（包括动植物）和衣料。没有农业的发明和发展，就不可能有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等社